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互动研究 ——以南诏德化碑为例

幸子依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聚焦南诏德化碑，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生成语境、发展过程及当代价值。南诏德化碑作为唐代西南边疆的重要历史文物，其碑文详实记录了南诏政权与唐朝、吐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生动展现了古代边疆政权在文化融合与政治博弈中的生存智慧。深入剖析德化碑的意蕴与价值，不仅能清晰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动态演进过程，更能深刻揭示其在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作用。这一研究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南诏德化碑；文明互鉴；中国叙事体系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17 日

中图分类号：I253.4

通讯作者：幸子依，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 ethnic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 a case study of Nanhao Dehua monument

Xing Ziyi

(School of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hua stele of Nanzhao, and discusses the generation contex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Dehua stele of Nanzhao.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elic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Dehua tablet of Nanzhao record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nzhao regime,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in detail, and vividly displayed the survival wisdom of the ancient frontier regime in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am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Dehua monument can not only clearly show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 its unique role i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so as to show the world a true,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image of China.

Key words: Nanzhao Dehua monument;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

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始



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任何文明都不是遗世独立的孤岛，而是始终处于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交流和互动之中。纵观世界历史的变迁，不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持续向前演进。”^[3]

2024年2月17日，“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会议聚焦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重要议题。此次研讨会的一大关键词“中国话语”，与曹顺庆先生近30年前提出的“失语症”遥相呼应。曹顺庆先生在文中指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发展，也削弱了中国学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4]

曹顺庆先生强调，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写文明史”成为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当借此契机，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并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新话语。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贡献。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5]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与时代需求下，将文明互鉴理论应用于多民族文学互动研究领域，其重要性与价值愈发凸显。文学，作为一种极具独特性的文化表征，是人类情感、思想与文化的高度凝练，它不仅能精准地勾勒出一个民族的精神轮廓，还能在不同民族间搭建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促进文化的流动与融合。

南诏德化碑兼具历史与文化价值，其文学属

性不容忽视。碑文运用丰富的文学修辞手法，如排比、对仗等，展现了南诏地区的语言艺术魅力。它不仅记录了南诏的历史事件，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民族精神，是一部生动的文学史书。

南诏德化碑作为古代多民族文学互动与文明互鉴的范例。南诏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碑文创作与传播融合了彝族、白族等民族的文化元素。碑文使用彝族彝文和汉族汉字，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碑文传达的国家统一认同、民族团结倡导等思想观念，是各民族共同形成的价值观反映，为后世多民族文学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深入研究南诏德化碑，能揭示多民族文学交流互鉴的发展脉络，展现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为文明互鉴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借鉴，为多民族文学繁荣提供学术支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其研究成果将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与对话，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一、“中心”与“边缘”：《南诏德化碑》的生成语境

由于中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便是氏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的文明碰撞场域。正如《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载：“群蛮种类，多不可记^[6]”，这种复杂的民族构成与多样的文化交融，为南诏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初唐以前，大理洱海周边分布着乌蛮、白蛮部落（即彝族、白族先民），其中蒙舍、蒙嵩、越析、浪穹、施浪、邓赅六部以“六诏”之名崛起，居南之蒙舍诏因地理优势得名“南诏”。据《蛮书》卷五所载，“蒙舍川‘肥沃宜禾稻’。”^[7]这一地理优势为南诏的兴起与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8]《蛮书》卷三也说：“蒙舍诏，姓蒙。”^[9]南诏的兴起不仅是族群融合的产物，更是文化交融的典范。南诏的文化实践始终贯穿着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南诏在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地位逐渐提升。公元739年，皮罗阁迁王城于太和城。《新唐书》载：“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蕃，寝骄大。”^[10]这一时期，南诏的政治地位逐渐提升，与唐朝的关系也日益



紧密。然而,这种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在天宝年间,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激烈冲突。天宝九年,南诏阁罗凤因属下部落的怨愤而发兵攻击河东蛮。唐云南太守张虔陀不仅不加以安抚,反而“谗构”加以陷害,派遣部队进行讨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贪图功绩,背弃了与南诏的友好关系,对南诏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南诏被迫进行了抵抗,阁罗凤大破唐军,并与吐蕃联盟以求自保。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立下南诏德化碑,此碑现藏于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原碑文约3800字,现存可辨识者仅256字。虽然南诏在天宝战争中取得胜利,击退唐军,但其首领阁罗凤始终无意与唐王朝长期对立。他期望通过立碑这一特殊方式,向外界清晰传达南诏在特定情境下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和无奈,并为南诏未来可能的再次归唐留下铺垫和契机。

《旧唐书·南诏传》记载:“天宝九载,阁罗凤为其属所怨,乃发兵击河东蛮,唐云南太守张虔陀遣兵讨之,阁罗凤大破唐兵,遂与吐蕃连和。^[11]”《蛮书》卷三又载:“阁罗凤常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12]”《新唐书·南诏传》也称:“(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13]”这些记载表明,南诏虽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其政治诉求始终局限于“存恩旧”的羁縻关系框架内。阁罗凤将叛唐行为归因于张虔陀的“谗构”与鲜于仲通的“背好贪功”,同时强调“世世事唐”的忠贞本心,并且拒绝吐蕃“赞普钟”的册封尊号,转而采用汉文化“皇帝”称谓。这种文化认同的选择,实为维系与中原王朝政治纽带的重要举措。唐朝在贞元十年(794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亦印证了南诏与唐朝在羁縻体系下的权力博弈逻辑。南诏通过军事胜利积累政治资本,而唐朝则借助文化认同来维持宗藩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不仅是南诏与唐朝关系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深刻改变了中古时期东亚的政治格局。

南诏德化碑的相关事迹也被多种古代文献详细记载。《蛮书》第五卷中明确记载:“(太和城)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断皇

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新唐书·南诏传》也有所记载:“(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考证后认为,《蛮书》与《新唐书》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均“录自袁滋《云南记》,即当时所了解之南诏人语”。由此可见,《南诏德化碑》所记录的内容是高度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它是历史长河中一段不容忘却、意义非凡且极具价值的重要篇章。

从碑文内容的学术价值来看,南诏德化碑具有独特且深远的意义。它通过采用多语种碑文形式,巧妙地记录了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历程。碑文运用汉字和南诏民族文字两种书写体系,内容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关键领域,既精准保留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要义,又有机融入南诏本土的独特文化元素,生动展现了边疆民族在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创造性转化能力。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语言文字复制或模仿,而是基于两种文化深度接触时的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的必然结果,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在交流碰撞过程中的高度适应性和卓越创新性。它深刻反映出在文明互鉴的宏大进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字、语言以及文化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并实现创新发展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积极相互学习借鉴对方文化优点,又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创新发展,从而有力推动了文化的共同繁荣进步。这种积极的交流互鉴现象,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自身文化的内涵,使其更具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的形成,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增添了独特且重要的价值,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南诏德化碑无疑是研究古代文明交流现象的关键实物资料,同时也能为当今世界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活动提供极为宝贵、极具启发性的历史经验借鉴。

南诏德化碑不仅是南诏历史的见证,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镜像。其文本生成深刻反映了南诏政权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这一过程展现了南诏在族群聚居与杂居格局中的文化活力,并为后世提供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的范例。南诏德化碑的生成语境,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



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为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此外，南诏政权的崛起与发展，是在与唐朝、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互动不仅包括军事与政治层面，更包括文化与经济层面的深度交融。南诏德化碑的生成，正是这种多层次互动的产物，它不仅记录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反映了南诏政权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深刻思考与实践。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体现在文化与经济层面的深度交融，为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南诏政权在族群聚居与杂居的格局中，通过文化认同与融合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体现在文化与经济层面的深度交融，为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二、文明互鉴：南诏德化碑的历史变迁

南诏德化碑作为南诏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三千余字的碑文不仅记录了阁罗凤统一六诏的功绩，更系统呈现了南诏与唐朝的复杂互动关系。该碑立于唐大历元年（766年），以“德化”为核心叙事框架，主要歌颂南诏王阁罗凤的功德，记叙了前期阁罗凤与唐朝相配合一步步统一六诏，开篇即强调阁罗凤“性业合道，智睹未萌^[14]”的治国理念，通过“二河既宅，五诏已平”的军事成就，构建了南诏“南国止戈，北朝分政”的区域治理格局。”

从跨文化互动理论的视角来看，南诏德化碑是南诏与唐朝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见证。碑文中大量运用儒家经典中的词汇与理念，如“德化”“仁政”等，这不仅是南诏对唐朝文化的模仿与认同，更是其试图通过文化同构来强化政治合法性的策略。这种文化上的主动适应与改造，使得南诏在与唐朝的互动中，能够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寻求与中原王朝的融合，从而在西南边疆构建起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在记叙南诏与唐朝的前期合作时，碑文详细描绘了阁罗凤与唐朝相配合，一步步实现六诏统一的过程。碑文中记载：“我王（阁罗凤）乃帅师徒，济二河，逾重阻，直指越析，迁其种落，于

是五诏稽颡，一诏就诛。”^[15]这一过程体现了南诏在唐朝支持下，通过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逐步统一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南诏政权。这种与唐朝的紧密合作，不仅为南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唐朝在西南边疆推行羁縻政策的成效与影响力。

然而，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矛盾与冲突逐渐显现。碑文以“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为核心议题，系统梳理了张虔陀“六大我”事件与鲜于仲通“背好贪功”的因果链条。碑文中记载张虔陀“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等六大罪状，这些叙述与《新唐书·南诏传》中“张虔陀以云南别驾，密构于杨国忠，欲尽杀南诏王族。”^[16]的记载相互印证，揭示了唐朝边吏的贪婪与不义行为对南诏与唐朝关系的破坏。

这种将政治冲突伦理化的修辞策略，在阁罗凤“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的悲情申诉中达到高潮。通过这种叙事手法，南诏政权不仅在道德上为自己的反抗行为进行了辩护，更是在历史记忆中塑造了自己作为忠臣受害者的形象。这种策略有效地强化了南诏在与唐朝对抗中的政治立场，同时也为其日后的归附留下了空间。

在天宝战争的描述中，碑文展现出鲜明的叙事张力。一方面，碑文以“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17]的克制态度彰显南诏的道德立场，这体现了南诏在军事胜利后，依然保持对唐朝的尊重与敬畏，强调其反抗行为是出于自卫与无奈，而非对唐朝的不敬。另一方面，碑文通过“流血成川，积尸壅水”的战场细节强化军事胜利的合法性，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惨烈与南诏军队的英勇，强调了南诏在战争中的正当性与必然性。

这种矛盾修辞在战争结局的处理上达到高潮。阁罗凤“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的举措，既是对唐军将士的人道关怀，亦是向后世传递“世世事唐”的政治信号。这种行为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极高的道德意义，它不仅体现了南诏对唐朝的尊重与旧情，更为南诏日后的归附留下了道德与政治上的余地。这种策略性叙事在唐代西南边疆史中具有典型性，与《旧唐书》“蛮人善斗，然得胜



不杀。”^[18]的记载形成制度呼应，反映了南诏在处理与唐朝关系时的智慧与策略。

从文化认同与制度构建的维度深入考察，碑文通过“阐三教，宾四门”“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的制度设计，系统模仿唐朝政治文化。这里的“阐三教”体现了南诏对儒、释、道三教的包容与整合，旨在构建一个多元而又统一的文化体系，为政权的稳定提供文化支撑；“宾四门”则展现了南诏政权开放包容的政治姿态，积极吸纳各方人才与文化，增强政权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当南诏“西开寻传”时，“革之以衣冠，化之以义礼”的经营策略，与《蛮书·寻传》中“俗无丝纆，跣履榛棘不苦也。”^[19]的原始社会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化改造实践在《南诏野史会证》中被精炼概括为“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城。”^[25]南诏通过对寻传地区部落的服饰、礼仪等方面的改革，积极传播儒家文化，推动当地社会的文明进程，不仅提升了南诏在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刻意强调的“清平官六人，位分九等”官僚体系，实为唐朝“六曹制度”的本土化重构。其“列尊叙卑，位分九等”的等级秩序，与《新唐书》“南诏官制，仿唐六部而设六曹”的记载相印证。这种制度上的模仿与创新，不仅反映了南诏对唐朝政治文化的深刻认同，也体现了南诏在制度建设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其能够在吸收唐朝先进制度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构建起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体制。

该碑的政治意图在异牟寻“三道遣使”事件中得到有力验证。贞元十年（794年），当唐朝特使袁滋持节至大理时，南诏君臣以碑文为据，强调“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最终促成“苍山会盟”的历史和解。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南诏德化碑不仅是南诏政权对过往历史的记录与总结，更是其在实践中运用文化资源、构建合理性的重要工具。

这种碑文与现实政治的紧密互动，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在边疆政权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南诏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框架的运用与重构，成功实现了从“叛臣”到“外臣”的身份转

换。正如德化碑所载“册汉帝而继好”，这种身份转换策略在《新唐书》“异牟寻归附，唐复册为南诏王。”的记载中得到充分体现。通过这种身份转换，南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唐朝的认可与支持，也在文化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为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地方政权通过文化认同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能够有效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20]南诏政权正是深谙此道，利用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实践，试图建立与唐朝中央政权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册封与朝贡，更深入到文化与思想领域，使得南诏政权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逐步融入中原文化体系。正如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中所指出的，“边疆地区的政权通过文化认同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能够有效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与稳定性”。南诏政权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度认同与积极实践，在政治上获得了唐朝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实现了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文化层面而言，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强调，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同化能力，能够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合为一体。南诏政权在文化实践中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并未全盘接受中原文化，而是在吸收儒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保留并发展了自身文化特色。这种文化融合模式，不仅促进了南诏社会内部的和谐稳定，也为其与唐朝的互动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种文化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南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贡献了独特力量。

三、凝聚与认同：南诏德化碑的当代价值

南诏德化碑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实物见证，详实记录了南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错综复杂且深刻的历史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南



诏德化碑碑文中“不得已叛唐”的表述以及“德化”理念的阐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叙事并非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在复杂的边疆与中原关系背景下，经过深思熟虑与审慎权衡后形成的话语表达。南诏作为地方政权，在与唐王朝的互动中，承受着维护自身尊严与生存发展的双重压力。通过“归罪于奸臣”的修辞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南诏的反抗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巧妙地避免了对唐王朝正统性的直接挑战，从而在名义上维系了边疆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纽带，这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把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本质特征”的重要论述。

在历史的演进中，边疆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既有军事上的对抗，也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南诏德化碑所记录的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变迁生动地展现了边疆政权在面对中央王朝时的矛盾心理与策略选择，也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1] 深入探究南诏德化碑，可见其“德”之理念是南诏立功建业之根本，而此“德”深植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政治理念及文化价值对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南诏政权在发展进程中积极吸收儒家文化，将其作为凝聚民族认同与构建政治秩序的重要思想基础。

南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践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与凝聚力。在多民族的中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22] 儒家文化凭借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促进了民族团结融合。当代社会，南诏德化碑所蕴含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凝聚力内涵，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具有关键启示意义。全球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挑战，我们应更注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认同为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在文化表现形式上，南诏德化碑出的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特质。碑文以汉文书写，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中心的辐射与传播，但在书写风格上又融入了边疆艺术的独特韵味。同时，它将晋唐书法的法度严谨与本土风格的灵动自由相结合，使得整座碑文既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又不失地方特色的鲜活气息。这种不同文化元素的和谐相融，正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魅力所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文明也这种“和而不同”的特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南诏德化碑所蕴含的历史故事与政治智慧，作为对外传播的优质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向世界传递“亲仁善邻、和合共生”的理念。这种理念与当下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和平与发展主题高度契合，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合作。同时，南诏德化碑的历史事实也能有效反驳西方的“分裂叙事”，有力地彰显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文化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国家，这种历史发展脉络是不可割裂的，任何试图歪曲或否定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的言论，都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当下，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此背景下，南诏德化碑所代表的中国自古以来的团结文明与开放精神，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素材。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故事背后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南诏德化碑所展现的这种思想与精神，能够使中国故事更加富有感染力，让中国形象更加鲜活，让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强大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文化智慧与力量。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3]。德化碑作为南诏时期的历史见证,不仅是边疆与中原互动的实物记录,更是中国叙事体系中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的重要象征。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政治价值,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边疆治理模式、传播“中国故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成为中国叙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学术界长期处于西方文论话语的“失语”状态,这种现象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尤为突出。他强调,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这种“失语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新话语,以更好地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24]”

德化碑作为这一理念的历史见证,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在文明互鉴中的开放姿态,也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历史借鉴。立足自身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中国以“各美其美”认知世界,以“美人之美”对待世界,以“美美与共”携手世界,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交流互鉴是文明的本质要求,人民日报,2019.09.12。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19.09.27。

[3] 新华社研究院: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新华网,2025.02.18。

[4] 余如波:《“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45在中西比较、文明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专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四川日报数字版》,2024年8月6日。

[5] 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6页。

[6]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 (唐)樊绰撰:《蛮书》卷五《六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8] (后晋)刘昫:《旧唐书·商蛮传》,北京:华书局,1975年。

[9] (唐)樊绰撰:《蛮书》卷三《六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2] (唐)樊绰撰:《蛮书》卷三《六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4] 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 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8] (唐)樊绰撰:《蛮书》卷五《六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9] (明)倪辂:《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0]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2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

[22]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统战新语言,2025年2月8日。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4页。

[24] 曹顺庆,刘诗诗:《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25-31+212页。

[25] (明)倪辂:《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作者简介:幸子依(2000-),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